

1966 届毕业证书诞生记

○ 王兆元（1966 届力数）

我们1960年入学清华，本该1966年毕业，因为正逢文革，一时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从学校的原各职能部门到国务院有关部委不是被砸烂，就是处于瘫痪，无法作为，上上下下没有人过问此事。到了1967年春，终于有同学按捺不住，行动起来，要求将1966届大学毕业生的毕业问题列入议事日程。领头的叫石福庆，是我们力数系力602班的，他们热心奔走，说理说情，最终惊动最高层。到入夏时节，终于传来了1966届即将毕业并分配工作的好消息。这可是关乎每个毕业生个人命运和数十万个家庭生计的大事！

要毕业了，毕业证书怎么办，还会有吗？要知道文革以来，许多先前曾经引以为荣耀的、与大学有关的，诸如学历证书、



力 604 班部分校友参加 2018 年马杯运动会开幕式方阵。右 5 为王兆元

奖状，甚至高考准考证、入学通知、考研证等等，因为出自“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或雪藏，或主动被动不得不弃之，甚至付之一炬。而毕业生内心有几个不看重、期待这张证书？这是我们青春的印记，是受母校、特别是清华这样的学校传道授业之恩以及六年寒窗的见证！

毕业就在眼前了，毕业证书这件事最后落在我班（力604班）姜延英同学的身上，当时他在校行政管理委员会工作并负有一定责任。经过他的努力，毕业证书终于发了下来。从1967年9月底起，我们怀揣着它，陆续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毕业证书屡屡用上，但无人知晓和探究我们的毕业证书当时是如何诞生的。而它又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除了有我们本人的证件照外，第一页上还赫然印着毛主席的像！这又是怎么回事？光阴如箭，我们都已步入古稀之年，回首往事，这本半个世纪之前的毕业证书的诞生故事应该浮出水面了。

2018年6月9日，我们班在北京的同学为到京看病的姜延英同学组织了一次聚会，有同学特地带来毕业证书，请姜延英揭晓其诞生之谜。当毕业证书被缓缓打开，51年前的往事瞬间涌上心头，谜底就在姜延英娓娓的话语中一幕幕向我们揭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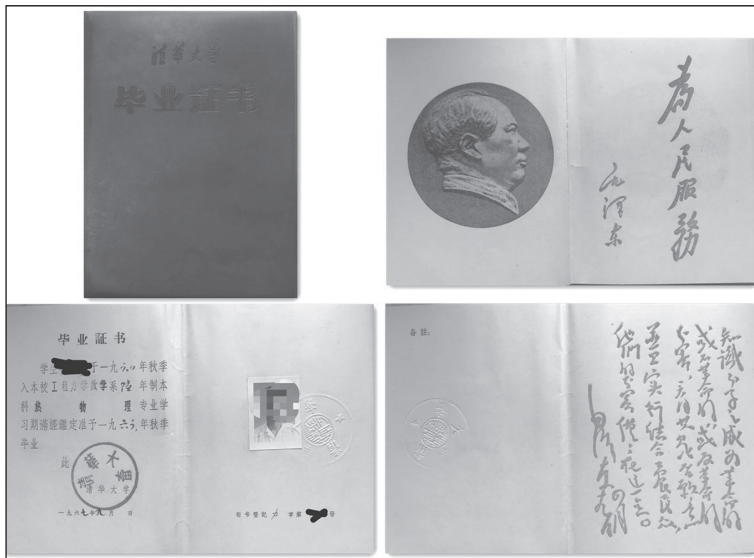
1967年，我当时在清华井冈山兵团行

政管理委员会，与张维教授负责学校承担的国家科研任务的管理工作。当毕业的消息传来，毕业证书也被提了出来。因为我是行政管理委员会内唯一的1966届的，便叫我操办此事。当时我没有看到任何文件，只是口头交代，而且文革正在进行中，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它也绝不是把原来的毕业证书样本拿来一填了事那么简单。大家比较一致的想法是：毕业证一定要办，但交代我不能张扬，否则会干扰文革，或反过来被文革干扰。我深知它的难度，因此压力很大，因为这次发证除与1966届有关，1967、1968届很快也会跟上，特别是1967届，毕业年限也已到了。当时各种消息传起来快得很，一个学校发毕业证了，北京其他高校，甚至全国高校很快就会传开，能否办下去并办成就会成问题，应有充分估计。总之，1966届毕业证书要尽量办得快并被通过，尽早发到每个毕业生手中是当务之急。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两手空空，一切从头开始。先说证书的封皮：如果封皮要新做，就涉及申请经费，问题就复杂了，时间就不可预测了。于是我到教务处寻找，找到了1964年四字班和1965年五字班的证书，得知1965年的封皮有存货，且数量不少，是红塑壳那种。如果直接用

五字班的红塑封皮，只要在校印刷厂印制内页，这样就能在毕业证书文本通过后快速印好证书，达到既快、又少为人知的效果，于是我就果断选定了这个红色的封皮。这样，从外观看，六字班和五字班的毕业证书是一模一样的，也很有连续性。

打开我们的毕业证书，第一页是毛主席像。毕业证书是一个正规文件，当年结婚证都有毛主席像，毕业证没有，那是过不去的。在我考虑的第一版证书时用了毛主席的标准像。样件出来后，我拿了样本与我班同学商量，王兆元同学看后，提出了一个看法：个人证件必须有持证本人的正面免冠照片，这是证件的要素，是必须的；现在把毛主席的标准像放上去，证书上便出现两张正面照片，不合适吧？我觉得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毕业证书的功能毕竟是证明持证人在我校学习期满毕业了。后来想到毛选精装本封面上的毛主席



1966 届毕业证书

侧身浮雕头像很合适，采用这样的头像不会被否定。又打听到解放军画报社有一个这样浮雕像的制作原模版，便开介绍信去借，没想到他们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毛主席的浮雕像就出现在我们毕业证书的第一页。

第二，是语录。当年没有语录也是不行。毛主席的语录有很多很多，我觉得“为人民服务”是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志向的，而且是要长期遵循的，于是用了这一条。

第三，里面的内容。前面的内容没有变，是毕业生的基本情况，“学生××于一九六〇年秋季入本校××系陆年制本科××专业学习期满”；紧接着原文是“现经校务委员会审查准予毕业”。这个委员会当时已不复存在，文化革命了，这是“封资修”，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还要他们认定？怎么办？我直接去掉，改为“经鉴定准于一九六六年秋季毕业”。到底是经谁审查鉴定，没说，因为只能模糊了，没法写“经校务委员会审查鉴定”，也不能写“经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鉴定”吧。我们心里都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在这个文件上就是不能说。文字之后是签章，以前的证书都是“校长蒋南翔”。当时，蒋南翔是大黑帮，部长不是了，校长也不是了，谁来签？这个地方也只能略去了，就直接盖上“清华大学”印章。

最后，是印章问题。“清华大学”公章和它的钢印，谁还承认它？是否还可以用？在当时，印章就是权力象征，要启用，很难，但我认为清华大学是公认的谁也否定不了。后来写了《请印申请单》申请用印，事由：毕业证书，总算

解决此事。由于两颗印章都不准取出，所以清华六字班全体约两千名同学的毕业证书上的红印和钢印全是由我亲手在办公室盖的。

应该说明的是，在制作毕业证书时，在行政系统上也得到了各系办公室、原校教务处及校印刷厂各位老师及工人师傅们的同情、理解与支持，帮助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如毕业证的印刷、装订，毕业生人员统计、审查，填写证书项目，粘贴照片等大量细致的工作，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几乎无差错地完成了。因为年代久远，我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甚至还有许多不认识的老师。借此，我向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姜延英侃侃而谈这个红色的毕业证书的诞生过程，并说，“这个证书可能大家还是不满意，但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既要快，又要不能被否定，又不可大肆张扬”。对此，大家都表示理解和赞扬，不时还发出会意的笑声。当听到姜延英亲手为全校六字班约两千个同学盖了四千个章，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今天，当我们再次拿起毕业证书，仔细翻看时，发现除以上内容外，姜延英还巧妙地在证书最后加了一页“备注”和一页毛主席语录。这样整个证书一共8个页面，打开毕业证书，中央两页正是证书最重要的要件——本人信息和准予毕业的结论以及本人的“正面免冠照”，以后我们要使用毕业证书时，要展示的正是这两页。

这，就是我们清华六字班毕业证书诞生的故事：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毕业证书的故事，一段无法尘封的青春记忆和人生往事。